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下)

张立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014043753

B2  
204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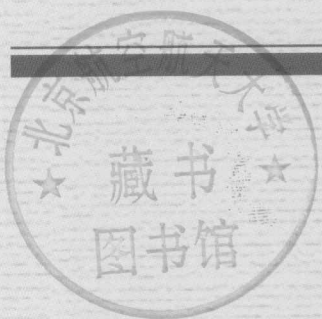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下)

张立文 著



人民出版社

B2  
204  
V2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肖 辉 周方亚 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全2卷/张立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01-013186-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9098号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ZHONGGUO ZHEXUE SICHAO FAZHANSHI

(上、下)

张立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14

字数:1923千字 印数:0,001-2,500册

ISBN 978-7-01-013186-3 定价:315.00元(上、下)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第五编

宋元明清造极期的  
理气心性哲学思潮



## 第三十章

# 理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宋元明清是理学哲学思潮由造极走向衰微的时期。两宋是中华文化学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造极期。所谓造极是指它是度越汉唐、融合三教、学风创新、学术繁荣的新时代；是学术多元、学派林立、大师辈出、自由论辩、成果辉煌的新时代；是科技发明、哲学创新、文史灿烂、理论丰硕的新时期。这是中华科学、哲学、文化的和合创生，中华学人的智慧凝炼，五千年文脉的绍承和发展。

### 一、冲突与危机

之所以能造极<sup>①</sup>，既有其内因，亦有外缘，内外因缘和合，而成造极。究其原是由内外因缘所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和危机，与在回应化解冲突和危机中开出的宋明理学。

第一，积贫积弱的冲突与社会危机。积贫是指民贫国贫。北宋王朝“不抑兼并”<sup>②</sup>，不立田制的政策，致使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田，无田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加上赋税盘剥，地方官吏从中渔利，徭役

<sup>①</sup> “造极”陈寅恪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sup>②</sup>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脱脱等撰：《食货志·农田篇》，《宋史》卷173，中华书局1977年版）。



苛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卖儿鬻女，离乡背井，四处逃亡。势官富姓，田连阡陌，70%土地被享有免税免役特权者所占有，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造成了国贫。民贫国贫，危机深重。

积弱是指国家军事力量衰弱，无战斗力。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残酷的赋徭压榨下，很多农民倾家荡产，公元993年春，四川贫苦农民在王小波、李顺领导下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sup>①</sup>的号召，掀起了农民运动。然后，各地农民动乱不断。宋王朝把主要力量放在平定农民动乱上，作为其稳定统治秩序的既定方针。欧阳修曾说：“臣窃见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扑灭渐难，皆由国家素无御备，官吏不畏赏罚。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sup>②</sup>而且是“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sup>③</sup>以农民动乱为心腹大患。赵宋政权有鉴于唐末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以及五代十国的战乱，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将领军政权力，采取了“强干弱支，致治于未乱”<sup>④</sup>的政策，防止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及将领兵变的内乱，但亦削弱了军事力量。军权集中于帝王的结果，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指挥不灵的局面。另一方面，外族的侵扰，加剧了积贫积弱的冲突和危机。北方和西北方的辽和西夏不断发动掠夺性、破坏性战争，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入侵，进逼澶州，虽在河北军民支援下，击败辽军，但订立了屈辱的和约，每年给辽白银和绢。西北方在西夏侵犯下，节节败退，宋与西夏和约，每年亦给西夏白银、绢、茶叶等。内忧外患，危机煎迫。为了化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冲突和危机，前有“庆历革新”，后来“熙宁变法”。王安石忧危深切，实行变法，以化解积贫积弱的形态。他试图采用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均输法、市易法，以解积贫；试图采用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以化积弱。然由于党派之争，政见冲突，新法行而又废，终不能挽北宋被金灭、南宋被元灭之命运。

① 脱脱等撰：《樊知古列传》，《宋史》卷27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96页。另见《蜀盗之平》，《宋史纪事本末》卷1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页。

② 《再论王伦事宜札子》，《欧阳修全集》卷98，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11页。

③ 《再论置岳御贼札子》，《欧阳修全集》卷100，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39页。

④ 司马光：《收诸道精兵》，《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第二，社会伦常的冲突和价值危机。中国传统社会，要求典章制度完备，伦理道德有范，社会安定有序，价值观念有定。然而，唐末藩镇割据，农民动乱，五代十国长期混战，中国社会又一次陷入大分裂、大动乱局面，致使纲常失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惘，而构成价值颠覆和意义危机。“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sup>①</sup>“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sup>②</sup>两宋学者面对的是一个动乱之世以后的礼崩乐坏、三纲五常道乖、宗庙朝廷失序、制度文章扫地的形势，宋代知识分子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重建价值理想、终极关切、精神家园等形而上信仰体系与形而下的实践体系。基于此，两宋的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自觉地担当起化解“积贫积弱”国势而富国强兵的责任。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实行改革，才能外御强敌，内安民心。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却使北宋愈趋衰弱。

由于原有的价值观念、典章制度、社会秩序已被摧毁，两宋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超越以往思想观念的创造新理论思维和新学术形态的重任，以人文关怀化解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的瓦解和破坏，以新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重新焕发新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召唤和敬畏，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情怀、天地意识为天地生民安顿安身立命之所，以适应新时代、新思维的需要，于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形态应运而生了。

第三，儒、释、道三教冲突和文明危机。自汉以来，印度佛教文明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发生激烈冲突。当两种异质文明发生冲突时，实际上是一种交流互动状态，它给冲突双方多方提出了思议之所以冲突的问题、其本质以及能否化解与化解途径等问题。这种反思使冲突各方的长短、优缺都凸显出来，各知其短之所短，长之所长，便可择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以己之优以优人之

① 欧阳修撰：《唐废帝家人传》，《新五代史》卷1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页。

② 欧阳修撰：《晋家人传》，《新五代史》卷17，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页。



优，这是文明冲突过程中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佛教文化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而逐渐中国化，中国传统儒教文明和道教文明也在与佛教文明融突中而得以细密化、逻辑化、体系化。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道教精密化、规范化、制度化过程，给儒教学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儒教文明必须改弦更张，必须吸收佛道之长，融突创新，使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论争转化为落实到新的和合体上，即理学哲学和合体，促其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潮的主流。

佛道二教价值观的传播，导致“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己，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矧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其为辱也大矣”<sup>①</sup>。孙复认为这是儒教之辱，这就给儒教的伦理纲常、价值理想以严峻的冲击，佛教的般若智慧、涅槃妙道和道教的玄之又玄、清静无为的理论体系，也为知识精英们所倾慕。然从唐代韩愈以来，尽管佛教文明居社会意识的强势地位，但在思维心理上总以佛教文明为夷狄，不是中华道统和文脉的传承，因此提出与佛教法统相对待的道统论，宋明理学家为建构度越佛老新的儒学理论思维形态，继承和凸显道统论，批判佛道二教，以为自己的新理论思维形态的合理性、正统性作阐述。但儒教之所以能度越佛道二教，就在于在理论思维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盲目地拒斥，而是合理地吸纳；不是保守旧教条，而是开出新生面。如此必须了解佛道，深入佛道理论思维，达到“尽其说”，才能度越佛道理论思维，于是理学家都出入佛道。张载是读《中庸》觉犹未尽，而去累年尽究佛老之说；程颢为求知而广泛地博览群书，出入释老几十年；朱熹体认到为己之学有未得其处，而出入释老，他赴进士试，只带《文慧语录》在身边。他们对佛道的理论思维，不是像柳宗元批评韩愈那样只知其“石”，而不知其“韞玉”的。一般而言，他们对佛老之学都有较深的造诣，而后反诸“六经”。他们是在把佛道之学与儒教“六经”之学放置在同一平台上，在比较中获得新体贴、新体验的，在儒、释、道三教对话、互动中取长补短，融突和合，从而转生为新儒学的理学，实现了从隋唐以来

<sup>①</sup> 孙复：《睢阳子集》，《泰山学案》，《宋元学案》卷2，《黄宗羲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页。

儒、释、道三教之学向理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变，并落实了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宋明理学文明的转生，化解了由儒、释、道三教冲突所带来的文明危机。

第四，儒学式微冲突和其生命智慧危机。宋代思想家、哲学家体认到，要复兴儒教，必须探索、检讨儒学式微的原因，因而当时士大夫的精英们都从精神价值导向、理论思维层面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在韩愈那里已强烈地意识到，他认为孟子之学已成为绝学。“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斲，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sup>①</sup>韩愈的历史反思既有思想层面的杨墨和佛老对儒学的冲击，又有政治层面的焚书坑儒，再有学者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以至大坏圣人之道，儒学面临危机。韩愈以“道统”承传者自诩，担当复兴儒学的重任。

韩愈对儒学危机的体认，获得宋代学者的认同。孙复说：“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继往，‘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后，破碎残缺，多所亡散。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sup>②</sup>汉时诸儒纷起注释经典，便有今、古经文之争。这不仅乱了“六经”，而且使学者不得门径。儒衰的原因在于注疏者不能发明创新，陈陈相因，使儒学教条僵死，而丧失其生命智慧。李觏在回答释老“修心养真，化人以善，或有益于世”时说：“夫所谓修心化人者，舍吾尧舜之道，将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于礼，苟简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辟杨墨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今山泽之隳，务为无求于

① 《与孟尚书书》，《韩昌黎集》卷18，《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本。

② 《寄范天章书》，《孙明复小集》，《四库全书》本。

世，呼吸服食，谓寿可长，非为我乎？浮屠之法，弃家违亲，鸟兽鱼鳖，毋得杀伐，非兼爱乎？为我是无君，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则罪可知矣。”<sup>①</sup> 佛道对儒学及国家社会之害，尤如杨墨。他们使儒教学绝道丧，并使国弱民贫。只有去佛道的“十害”，才能使人民乐业，国家富强。这种儒教复兴的诉求，是与国家意识相联系的。

如果说李觏从政治哲学层面反思儒衰，那么，王安石则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儒衰。“然孔氏以羈臣而兴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诡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sup>②</sup>。孔孟之学既遭秦焚书坑儒之灾，又遭汉儒章句传注之繁，丧失源流之正，出现“文胜质”、“博溺心”的弊端，造成“淫辞诡行”昌盛，而“妙道至言”隐退的情境。

张载和二程均有鉴于儒学精髓在秦焚书后遂失的形势和汉儒“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sup>③</sup>，失却儒学真精神的情况，主张回到儒学源头孔孟那里去。张载认为，自佛教“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贤门墙”<sup>④</sup>，又“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sup>⑤</sup>，只有穷儒学之源，才能体认儒学真精神，而度越“汉儒补缀，千疮百孔”的弊病，不至“沧胥其间”。程颐批评汉儒解经，“《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sup>⑥</sup>。这只能散乱破碎儒学的本真。

宋代思想家、儒学家对儒衰道盛、儒弱佛强的反思，是要重新唤起儒学的生命智慧。如此，必须从笃守汉唐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从“师法”、“家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疏不破注”的陈陈相因中冲决出来，只有转汉唐章句训诂之学成“六经注我”的义理之学，才能使儒学开出新生命，化解生命智慧的危机。

① 《富国策第五》，《李觏集》卷16，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② 《除左仆射谢表》，《王临川全集》卷57，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361页。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

④ 《与吕微仲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51页。

⑤ 《与赵大观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50页。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

## 二、新文化、新学风

宋代思想家、哲学家面对此四大冲突和危机，都怀有担当化解冲突和危机的价值自觉意识、智能创新意识、历史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意识。然而，学术思想的创新、哲学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哲学家的自觉担当，而且需要有宽容的人文语境。尽管政治、经济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比较直接的是文化政策所营造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中央集权社会中，若无比较自由的、宽松的思想学术环境，哲学的智能创新是很难实现的。北宋的思想学术环境，哲学的智能创新的氛围究竟如何？北宋的“佑文”文化政策为道学的化生提供了政治的、人身的保障。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五代武臣拥兵自重、谋权篡位的教训，“由是大重儒者”<sup>①</sup>，对儒者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并立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sup>②</sup>。这就给了儒臣和士大夫以思想言论、著书立说的自由的、宽松的人文语境，使得儒臣、文官敢于针砭时弊，士大夫们亦敢于冲决传统经学权威的网罗，发扬理论思维创新的主动性，提出了种种创新的理论思维形态，推动了宋代哲学思潮的转换，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

王夫之曾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sup>③</sup>士大夫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都可在所不惜，然而由于自己追求真理而累及九族甚至亲朋学生，这就比牺牲个人更可怕、更残酷，压力更大。“誓不杀士大夫”，不仅激励起士大夫们哲学思想创新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而且敢于冲决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之言的“五经”的权威，士大夫们以“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纷纷发挥各自思想智慧及哲学创新精神，他们以“自作主宰”的自由主体，互相探索论争，互相启发、吸收，“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在哲学论争中，他们能够做到互相尊重“他者”，作为论争对象是互为对象，相互

① 脱脱等撰：《本纪·太祖三》，《宋史》卷3，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页。

② 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1《君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③ 《太祖》，《宋论》卷1，《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4—25页。

平等。黄宗羲描述的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论争，就是体现了学术思想论争的自由性、平等性，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思想人文语境和文化环境，促使哲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如王夫之所说“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sup>①</sup>的原因所在，也造就了新的理学哲学思潮的化生。

假如两宋的学术思想、哲学思维的论争维持在良性的学术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么，中华学术、哲学成就必将取得更加光辉的“造极”。然而，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一身兼任、官学同位，没有纯粹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既关注形而上学之道的求索，也关怀形而下百姓的日用。他们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抱负，不仅为“继绝学”而提出各种创新的哲学思想、逻辑体系，而且为“开太平”而设计种种政治改革方案和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相依不离。这不仅制约了其哲学思维的深入和体系创新的成就，而且往往易于把学术思想的论争引向政治论争，也易于把学派之间的论争转换为党派之间的斗争，把学术思想的论辩引向歧途。

“庆历新政”把一批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推上政治舞台，他们直言谏论，廉耻相尚，名节相高，成为士大夫们的新风尚。“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播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sup>②</sup>当时士大夫们为了化解国家“积贫积弱”的危机，司马光（涑学）、二张（张载、张戢兄弟，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洛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蜀学）都提出了改革的主张。“熙宁变法”之初，其中有的支持变法，有的同情变法，也有反对变法的，张戢支持变法，二程也曾持支持态度。程颢说：“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刚而独断，霁然不疑，则万世幸甚！”<sup>③</sup>他批驳了以更张为大害的论调，要求神宗刚乾不疑，不要因循守旧，以致败乱，要改易更张，变法图

① 《太祖》，《宋论》卷1，《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页。

② 脱脱等撰：《列传·忠义一》，《宋史》卷44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9页。

③ 《论王霸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1，《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1—452页。



强。同时程颢既批评“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的陋儒之见，又批评“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的“祖宗不足法”<sup>①</sup>之见。程颢的《论十事札子》在“为往圣继绝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并非都是“迂疏无用”之说。这就与王安石的“三不足畏”思想殊异，再由于改革的具体方案、方法措施的分歧，王程之间便发生冲突：“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及后来逐不附己者，独不怨明道”<sup>②</sup>。这种冲突往往是思想的、政治的、情感的，纠缠在一起，以致“荆公新学”与洛学发展为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的态势。元祐元年（1086）反对变法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执政，熙宁新法被废，变法派遭排斥。其间程颐洛党与二苏蜀党又发生冲突，程颐遭弹劾。<sup>③</sup>次年被罢经筵，洛党有关人士罢外或迁职。绍圣四年（1097）新党又当政，再贬元祐党人，程颐被送涪州编管。不断的党争，有关士大夫精英们被党争所困囿，不能进行理智的学术探讨，特别是不能在不同意见（包括不同政见）间进行学术论辩。不同学派利用其当政的政治权势，排斥、打击异己学派，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制造“元祐奸党”案等。这样就堵塞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丧失了互相汲取和融合，妨碍了北宋哲学思想更辉煌的发展。

南宋时期朝野上下为靖康之耻所笼罩，抗金成为首务。政治论争主要围绕战与和而展开，哲学思想的论辩还可在一定学术范围内进行，而较少受党争的干扰，如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论争，朱熹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辨等。然而一旦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也难逃被打击的后果。朱熹就是在赵汝愚与韩侂胄的政治斗争中被涉及，而成为“伪学逆党籍”中的重要一员。如果把一种学说打成伪学或邪说，就压抑了学说的发展，破坏了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和辩论的氛围，于学术思想、理论思维的发展大有妨碍。中国的学术思

① 《论十事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1，《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2页。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19，《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③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谨按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人物纤污，天资儇巧。贪黷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籍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河南程氏外书》卷12，《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页）。



想、理论思维总是在与政治的千丝万缕中发展——压抑——发展的。这就是说，尽管政治干预学术思想、理论思维，但学术思想、理论思维有其特然卓立的品格，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理路，因此，哲学理论思维在“不杀士大夫之誓”的人文环境中，以士大夫自觉担当创新哲学理论思维、重构伦理道德、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思议下，两宋哲学理论思维仍然争得卓越发展的空间。这既为化解所面临的四大冲突和危机营造了良好的外在因缘，也开发出士大夫们智能创新的理论思维、价值理想的潜能，激荡起转隋唐儒、释、道三教之学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潮。

### 三、理学的称谓

宋明理学哲学思潮作为一定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它是一次从“疏不破注”的经学桎梏中冲决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重塑精神价值理想殿堂的标志。它比较成功地回应和化解了时代所面临的四大冲突和危机，凸显了中华文化唯变所适的生命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所谓理学，是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种哲学理论思维形态，是融突儒、释、道三教思想之长而形成的重义理的思辨性的学说，是探赜宇宙、社会、人生所当然和所以然之道的道的哲学逻辑结构的总和。由于理学的大化流行与理学家在不同时空、人文语境中不同的体贴和诠释，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内涵和精神，便产生多种称谓，凡道学、理学、性理学、宋学、新儒学等，是较为常见的指称。

“道学”的名词，北宋已有，乃是指具有道统意蕴的传道之学。程颐在元祐二年（1087）四月《又上太皇太后书》中说：“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sup>①</sup> 此处道学非指特定学派。此前张载曾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sup>②</sup> 把道学与政术相提并论，道学是指伦理道德教化之学。程颢死后，程颐请孙叔曼为其兄撰写墓志铭的信中说：“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

<sup>①</sup> 《河南程氏文集》卷6，《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2页。

<sup>②</sup> 《答范巽之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9页。

闻，此尤深可哀也。”<sup>①</sup> 道学是指求道的学问。程颐亦称程颢之学为道学：“呜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sup>②</sup> 道学是指程颢的学说，扩充之是指程氏兄弟的学说。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道学甚盛。“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sup>③</sup>。道学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所以为帝为王和设教的原因或依据，是讲廉介、恬退、践履、名节的士君子的品德。“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sup>④</sup> 朱熹继承二程而倡道学。朱熹追溯道学之源，认为“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庸》就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sup>⑤</sup>。这样道学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学说，并非为特定学派的称谓。然而孟子以后，道学失传，二程出，才继绝学。“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学，可谓盛矣。”<sup>⑥</sup> 由于南宋存在一股反道学的潮流，朱熹曾慨叹：“近世道学衰息”。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sup>⑦</sup> 道学被目为欺世盗名的学说。有鉴于此，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上封事，对道学作了辩白：“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sup>⑧</sup> 道学为一班“刚毅正直”、“守道循礼”的有识君子，相反诬之以罪，来欺蒙、迷惑圣听。十数年来以“道学”二字禁锢天下贤人君子的传道，导致社会风气愈来愈败坏。

① 《上孙叔曼侍郎书》，《河南程氏文集》卷9，《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3页。

② 《祭李端伯文》，《河南程氏文集》卷11，《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3页。

③ 脱脱等撰：《元史列传》，《宋史》卷38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29页。

④ 脱脱等撰：《元史列传》，《宋史》卷389，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29页。

⑤ 《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⑥ 《程氏遗书后序》，《二程集·目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⑦ 冯琦编：《宋史纪事本末》卷80《道学崇黜》，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9页。

⑧ 《戊申封事》，《朱文公文集》卷11，《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5页上。

从南宋道学与反道学的冲突以及被打入“伪学逆党籍”的名单来看，道学的外延较窄。据朱熹编的《伊洛渊源录》的谱系来看，道学实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及其门人弟子。此时所谓道学便把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司马光“涑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陆九渊兄弟的心学、吕祖谦的“婺学”，都排除在外。朱熹曾说：“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于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语，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教。”<sup>①</sup>道出了为什么把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及陆九渊排斥在道学之外的缘由，亦流露出道学受内外攻击作坏的忧虑心情。

当时陈亮、叶适、陆九渊对道学都有所批评，而表明自己非道学家。陈亮说：“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要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sup>②</sup>自认为不矇瞳附于道学。叶适说：“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sup>②</sup>道学弊端在于以天下之学不能致道，唯独他们能致道，这样就把道学与天下之学对立起来，以自己非道学之列。陆九渊说：“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sup>③</sup>不能完全责备攻击者，道学家自身也有毛病。“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sup>④</sup>。道学之所以遭致攻击，与道学自立门户，骄其声色，而引起人的不平之心有关，所以深排力诋道学，其深层原因则是政治见解、价值观念的分歧。

基于此，元丞相脱脱在修《宋史》时，特立《道学传》，这是前史中所没有的，并将其置于《儒林传》之前，列入周、程、张、邵、朱及其门人，这个名单基本上与《伊洛渊源录》一致，唯增朱熹的师传、弟子及张栻。

① 《与刘子澄》，《朱文公文集》卷35，《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564页。

② 《答吴明辅书》，《水心文集》，《叶适集》卷29，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4页。

③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0页。

④ 《语录下》，《陆九渊集》卷35，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7页。